

964
10
陶鑄同志八月十日

對廣州五所高等學校教師的報告

根據八月八日教師們在座談會中提出的意見，今天準備談談五個問題：

一、鎮反運動是不是太可怕了？

廣州機關、學校和各個部門方面，有些人有這樣看法：「鎮反運動是太可怕了。」我們的看法：鎮反運動是必須搞的，鎮反運動不但是不可怕，而且是人民一件大喜事。從我們五個高等學校、全市以及全國範圍來看，反革命對人民革命事業的破壞是非常猖獗的。如果對反革命的破壞不加以鎮壓的話，這只有一個結果，便是使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受到破壞。鎮反運動是保衛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反革命的破壞對大家都有害，鎮反運動要把反革命搞掉，這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廣大人民和革命幹部是贊同鎮反運動的，是擁護鎮反運動的。

在過去幾年來，要在機關學校內部搞鎮反運動，是不可能的。在全國剛剛勝利的時候，以廣東來說，在一九四九年剛解放後，當時主要的任務是肅清殘餘反革命軍事、

力量；完成土改，徹底消滅封建階級。當時主要任務是把社會上反革命敵人徹底摧毀，不這樣是不可能進行純潔內部的。在全國經過社會上鎮反運動，完成土地改革之後，本來可以進行純潔內部的工作，但隨着來的是抗美援朝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這些運動也是必要的。因此在這樣外部問題還未解決以前，不可能騰出手來搞清內部的反革命問題。同時，在今天以前，沒有經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暴露，沒有經過在中國共產黨內高饒事件和潘漢年事件的發現，幹部與羣衆的警惕性不會那樣高，覺悟也不會像今天那樣高，沒有廣大幹部和羣衆的覺悟提高，是不可能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只有經過胡風反革命集團、高饒事件、潘漢年事件的揭露後，大家看到黨內那樣高級的幹部會是反革命分子，黨內也有反革命分子，特別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更大吃一驚。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披着馬列主義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他們搞了二十幾年，活動範圍很大，搞的事情又這樣多，而我們過去還以爲他是「思想問題」，後來才揭露出原來是以文藝作幌子的反革命集團。這樣經過揭露反革命的活動，教育了羣衆，提高了幹部，使大家大吃一驚，認識不應有太平麻痺觀念，必須把內部純潔起來以後，即着手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便是很合時宜的了。

對反革命分子來說，也不能搞得過早。在一九四九年解放時，我們頒佈約法八章，說明了過去進行反革命的，只要今天歸向人民，是得到人民寬大。我們向來都是主張先禮後兵的。對反革命分子，我們首先講寬大，只要歸向人民，與人民合作，我們

是歡迎的。這樣寬大政策，若不經過幾年，當時便予以鎮壓的話，那便是不教而殺，不是「先禮後兵」。但是在五年後，當人民已給他們以相當長的時間改過自新，而他們還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還在反對我們，那便是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那就不能說我們不教而殺，不先禮後兵，而是要反革命分子「後果自負」。所以過去在我們內部不早搞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對反革命分子來說，也可以說我們是在等待他們希望他們能放棄其罪惡活動。

鎮反運動是不是可以推遲呢？不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已過了二年多，現在已經是八月，再過四個月，五年計劃已經進行了三年，而內部還不純潔，社會主義建設是沒有保證的。比如若不把潘漢年這些反革命分子搞掉，上海是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上海的。若不把胡風反革命集團搞乾淨的話，讓他發展下去，整個文藝陣地便有可能被篡奪，受毒害的青年更多（現在已經害了不少青年了）。我們看得很清楚：今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從外部鑽到我們內部來進行破壞。因為今天黨在人民羣衆中有很高的威信，全國人民都擁護中國共產黨，反革命分子要從外部來破壞我們，這是不可能的，故此他們便要鑽到我們內部裏面來。今天如果不把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搞乾淨，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順利進行，就是建設好了也保不住。現在很多大工廠，是用多少人民血汗建設起來的，反革命分子可以很快就把它破壞完了。例如長江大橋要好幾年才能建成，如果反革命分子破壞的話，只要一點鐘，好幾年的功夫

便會被反革命分子破壞掉。另方面爲了保衛我們革命的成果，不把反革命分子搞掉，也是不行的。今天反革命分子要把人民革命事業徹底摧毀是有困難的，但若果我們毫無警惕，一直不搞鎮反，太平無事，正如中國有句老話說：「死灰可以復燃」，那時，使革命受到暫時的挫折，這是完全可能的。

總之，鎮反運動是必要搞的。早搞有困難，遲搞受到更大損失，現在搞是適時的。鎮反運動既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在幹部、人民羣衆裏面，看法是不一致的。大約有三種人有三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是堅強的革命者和廣大的人民、幹部。他們是熱烈擁護鎮反運動的。如廣州各方面正搞得很緊張。五所高等學校在假期裏也搞了一陣鎮反。高等學校師生是很熱烈擁護、贊同、支持和參加鎮反運動的。第二種基本上是好人，這就是說他們不是反革命分子。但是他們立場不是那樣堅定，或思想上有些問題，對鎮反運動有疑慮。這種情況，在機關、部隊和學校都有。所謂立場不夠堅定，便是對反革命分子仇恨不那樣深，義憤不那樣大。第三種是反革命分子，他們對鎮反運動是堅決抵抗和破壞的。因爲鎮反便是要鎮壓他們，他們當然是堅決反對的。但這是極少數。

人民日報社論說：我們人民內部絕大多數是好人，即有百分之九十幾，這些好人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沒有這些人，革命便沒有今天的勝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也是不可能設想的。但是也有百分之幾是壞人，是反革命分子，這是極少數。儘管

如此，鎮反運動比三反、五反是更加尖銳、複雜和激烈的。三反是解決內部的思想作風問題，即貪污腐化問題，而鎮反運動是一個敵我問題。開展坦白檢舉運動以來，是很緊張的，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是革命與反革命成敗的問題，這是革命成功或是革命失敗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每一個人都牽入運動中去，每一個人都要表示他的態度，是擁護它還是反對它，每一個人在運動中都受到考驗，和獲得鍛鍊。在鎮反運動中，不能說與自己完全不相關，在運動外邊旁觀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政策，是充分依靠廣大的革命人民，爭取團結好人，堅決打擊反革命分子。我們必須把百分之九十幾的好人團結，決不把好人當作壞人，決不冤枉一個好人。有關人民內部的事情，如一些歷史問題和思想問題，由人民內部來解決。我們必須劃清界綫，只有真正是反革命分子，才加以打擊。劃清界綫，團結好人，打擊反革命分子，這樣做也是爲了保護好人。我們這樣做，才能做到如羅瑞卿部長所說的：堅決、乾淨、徹底、全部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才能做到堅決團結好人，打擊少數，大家看清反革命分子的罪惡，把反革命分子孤立，使他們成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要堅決、乾淨、徹底、全部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除了要劃清界綫，團結好人，孤立敵人外，對反革命分子還採取寬大處理的政策。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這樣仇恨，爲什麼對他們還要寬大處理呢？有如下理由：首先目前中國大陸上潛伏的反革命分子的精神狀態和他們的處境是可憐的，心情是痛苦的，不是很愉快的。他們爲什麼還進行

反革命活動呢？我看大多數是由於被欺騙。比如相信「反攻大陸」這一套。蔣介石還會反攻大陸嗎？大家是不會相信的，蔣介石只有三十來萬殘敗軍隊，就是要到廣東來也沒有這樣本事。現在就是連蔣介石自己也不相信。蔣介石曾說五四年反攻大陸，可是五四年一江山島、大陳島都被解放了，蔣介石改口了，現在再不敢提時間了。特別是中美談判以來，台灣物價高漲得利害，堅決反動的人都要找關係，準備退路了。可是許多反革命分子由於階級本能蒙蔽了，故此看不清全面的情勢，因而自己容易被欺騙並在那裏欺騙別人。但他們畢竟還是在「自欺欺人」的境況中過日子，內心還是很矛盾的。另外，凡是反革命分子都做了一些壞事情的，對不住人民的，現在有些想不做壞事，又怕得不到人民的寬大，他們思想有矛盾的。他們會考慮到，如果他們坦白，得不到人民的寬大，他們為什麼要坦白呢？他們這種顧慮、懷疑，表明他們對我們的政策不了解。但他們是在矛盾之中。革命的目的是要取得勝利，在取得勝利後要徹底鞏固勝利。對反革命活動必須鎮壓。但對反革命分子殺掉是一個辦法，不殺掉，改造他們也是一個辦法，同樣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故此我們採取寬大處理的政策，不是十分適當的麼？

但寬大處理必須與羣衆壓力相結合。因為反革命分子都是十足的唯心論者，他們總以爲人家看不出他是反革命分子，存着僥倖心理，故寬大處理，又依靠發動羣衆起來揭發、檢舉、加壓力是絕對必要的，是相輔相成的，不這樣，他那裏知道別人知道

他是反革命分子呢？我們過去打仗，是採取三面包圍，城開一面，迫其投降的辦法，如果四面包圍逼得敵人作困獸之鬥，雖也可把城攻下，但傷亡會大，時間也慢。鎮反運動採取寬大處理與羣衆壓力相結合也是這個道理。我們要發動羣衆，要他們向人民坦白交代，但要他們知道政策，我們還要很好的反覆交代政策。這樣，他便會考慮要坦白得到寬大好呢，還是頑抗被鎮壓好呢？我想絕大多數的反革命分子是會走前一條路。與其被鎮壓，爲什麼不坦白交代？死頑固，執迷不悟想當蔣介石的「孤臣孽子」的，那只是極個別少數的人。這個政策在各機關，都是取得效果的。這次中山大學有兩個學生寫反動標語，在學校進行破壞活動，其中一個，等了六天還不坦白。故此要把他抓起來，再不讓他讀書。抓起來怎樣辦？殺倒不殺他，一個青年殺了實在可惜，要他勞動一下，去讀「勞動大學」。師範學院有一個教授和醫學院一個講師自殺了。爲什麼自殺呢？鬥一下便自殺，實在膽子太小了。也許有不可告人之隱。據材料看來是不應當自殺的，若再有壞的事情，講清楚也可以，講出來還是可以教書的，現在自殺了，講也講不清了。有人說：「是有神經病自殺的。」假若說有神經病，爲什麼早不自殺，遲不自殺，剛巧現在自殺呢？恐怕是我們交代政策，還是不夠清楚，而羣衆火力又很大，一時思想糊塗，便自殺了。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不進行反革命活動，由反革命變到不反革命，由不反革命變到革命，不是還有前途嗎？當然，由反革命變爲革命是難的，而且必須要有一個過程，但是由反革命變到不反革命總是可以的，這除了

極少數的反革命分子外，大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故此，肅清反革命並不等於把所有反革命分子都殺掉，這與反革命分子的殺人不眨眼的行爲不同。只要他們還可以改造，人還是有用的，一個人長到這樣大，不是很容易的，一刀殺掉，是太可惜了。不了解我們政策因而自殺，更是冤枉。當然，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還是要殺個把子人的。因爲他們總是要破壞，罪惡極大，而又至死不悔改。

有人罵我們比秦始皇還要壞。究竟秦始皇多壞？你們知道的，秦始皇最大的壞事是「焚書坑儒」。據說秦始皇坑儒時，坑了四百六十多個方士。我們解放後，幾年來殺的，也的確是不只這個數目。當然，我們殺的不是什麼「方士」，而是那些血債纍纍、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的反革命分子。這是秉承人民的意志才這樣做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不願意殺人的，我們是主張寬大的，就是對那些拒不坦白，堅決破壞頑抗的反革命分子，才不得予以鎮壓。今天我們雖然等待了五年了，如果他們決心坦白、悔改，我們還是要寬大處理的。我們叫做革命，叫做共產黨、人民政府，他們叫做反革命，叫做國民黨，他們爲什麼要鑽進我們人民內部我們共產黨裏來，進行破壞活動呢？我們是有充分的理由要把他們肅清的。

在高等學校採取寬大處理政策，要更特別寬大。第一、在解放前不管他如何反革命，解放後交代了，同時在解放後還做了好事，那就應當特別寬大處理，不僅既往不咎而且要保證其工作職位。第二、在解放前有反革命活動，與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有組

織關係，做過破壞活動，但解放後沒有進行反革命活動，願意交代（就是現在交代也可以），那也同樣寬大處理，既往不究依舊工作下去。第三、解放前有反革命活動，與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有關係，解放後沒有交代，還做了一些壞事，但現在交代了，願意洗手不幹的，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可以寬大處理，既往不究，並給以一定的工作。

這樣是不是太寬大了呢？我想這是寬大了些。但這樣寬大有好處，目的是要把反革命肅清，如果一個反革命分子堅決與反革命脫離關係，多一個人站到人民方面來有什麼不好呢？只有那些堅決反對革命的，堅決反對人民的，才要堅決鎮壓。比如中山大學兩個學生的處理有所不同，有一個坦白，就給他機會，再看看。這樣是否會被反革命分子鑽空子呢？這是可能的。他們會認為在學校進行反革命不要怕，會遇到特別寬大。故此，寬大也要有一個界綫，我們在時間上要劃一個界綫，即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要坦白就應當自動坦白，老是拖延下去是不成的。

目前潛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點有三：第一是兩面派的活動；第二是秘密的活動；第三是分散活動。所謂兩面派的活動，便是說他們不會說「我是反革命」，而是要兩面手法，表面上裝得好像很革命，暗中便拚命進行反革命活動。所謂秘密的活動，便是說他們不敢公開，而是潛伏掩蔽在落後羣衆裏面。所謂分散的活動，便是說他們這裏搞一下，那裏搞一下，這裏打一打，那裏打一打。他們搞兩面派活動，搞秘密活動，只要羣衆發動起來了，覺悟起來了，眼睛擦亮了，落後羣衆也起來了，他們便潛

伏掩蔽不成，反革命的行爲是能看出來的。就是他們搞分散活動，只要各方面羣衆都發動起來，大家揭露，就會把他揭出來。不是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經過羣衆紛紛揭發，提出了三十多條罪狀，條條都要他回答爲什麼這樣做，他是答不出來，這樣他便不得不低頭認罪了麼。故此，只要我們領導上是清醒的，一方面依靠政策，一方面發動羣衆，反革命分子是逃不過去的。

高等學校的鎮反，還要繼續搞下去。這次搞了個半月，刮了一陣颶風，風是很大的。雖也刮掉了些灰沙，但問題還不是完全解決了的，不能估計得過高。但是今後搞也不像這次刮颶風一樣，颶風也不再刮了，今後搞法，要用細水長流的辦法，幫助學校繼續搞清楚。什麼叫做細水長流的方法呢？一方面開學後繼續上課，團結所有教職工，把學校的各種組織嚴密起來，把鎮反工作結合日常工作與教學工作進行；一方面拿這次運動教育羣衆，使廣大羣衆認識反革命的危害，鎮壓反革命的重要，以擦亮羣衆的眼睛，大家防範與注視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這樣，只要有反革命分子露出來，便會加以解決。今後在學校中，要團結所有的教職工。我們要分別清楚，什麼是反革命分子，什麼不是反革命分子。所謂反革命分子，是指那些與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特務有聯繫的，有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那些有些不滿，講些怪話，發些牢騷，有些自由主義的，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是在歷史上多少有些污點的人，也不能一律看作是反革命分子。有關人民內部的問題，由人民內部來解決。這些我們都應該加以區別清楚的。

高等學校不搞純潔是不成的。高等學校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各方面人才的學校，國家經費得來很不容易，花這樣多錢辦高等學校，就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現在沒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建設社會主義是不行的。如果學校不純潔，培養出來的人，不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而是社會主義的破壞者，這是對不起人民的！而國家的錢也是白花了！依照自然發展的規律，我們這一代人總是要死的，我們要有接班人，若果接班的人，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資本主義，這樣豈不是替反革命復辟鋪設道路，豈不是成了祖國的罪人嗎？故此，我們不但要教會學生有本領，有工作能力，而且要教會他們忠心爲社會主義服務，爲總路綫服務，並隨時注意把那些反革命的渣滓清除出來。要不然，我們便不用辦學校了。我想，這是我們每一個教師應有的責任。

二、團結知識分子政策是不是改變了？

這次鎮反運動是健康的，搞得很好。但這次是颶風刮了一下，也許有些不是反革命分子也被吹了一下子，有人便懷疑了，說：「團結知識分子政策是不是改變了？」我們說：團結改造知識分子政策，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不可動搖的方針。只要我們國家還未達到很高水平的階段，如共產主義社會，那時階級沒有了，城鄉區別沒有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區別沒有了，全國人民都有知識了，那時知識分子政策，也許要改變，但是今天我們國家還是落後，階級還未消滅，城鄉區別還未消滅，體力勞動與腦

力勞動區別還未消滅，過去在舊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是很需要的，是很有用的。因為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科學技術是不成的，知識分子是可貴的。在舊社會國民黨統治時候，他做過什麼好事情呢？農村破產，工業沒有搞，幾條破鐵路，鋼鐵每年產量不到四萬噸，沒有做過什麼好事，就是貪污還未把教育經費貪污完，辦了一些學校畢業了一些學生留下了舊社會這點財產。那麼，鎮反是不是影響到對團結知識分子的態度呢？不影響的。鎮反是要把反革命摧毀，這是革命與反革命問題，不是知識分子的團結與否問題，鎮壓反革命與團結知識分子不能混同起來。正如潘漢年是一九二四年的黨員，現在把他抓起來，能不能說把二四年前的黨員都不要了呢？現在問題因為他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不管什麼都要加以鎮壓。如果他不是知識分子，甚至他祖宗十八代都是道地的工人階級，只要是反革命也是一樣要搞掉的。相反，鎮反打擊了反革命分子，更加有利於爭取團結知識分子。因為反革命分子從中造謠破壞，挑撥離間，影響了團結。如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不是集團裏面每一個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呢？不是的，因為他們披着馬列主義外衣進行活動，很多人便被欺騙了，故此肅清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受影響的人，便少得多。破壞黨與知識分子團結，這是反革命的一個方針。蔣介石在台灣，反革命分子在香港，對胡風事件不是大肆歪曲宣傳嗎？說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裏是沒有出路的。因為對革命有利的，對反革命便不利了，故此他們便破壞了。過去有些人對黨不滿，對黨不大靠攏，就是受反革命分子的挑撥。這次鎮反運動

不可能影響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而是更有利於團結。

第二點，有些教師有這樣的意見，說：「鎮反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數，就是共產黨老是搞運動不好，搞鬥爭，思想批判，老是要檢討，中國古語說：士可殺，不可辱，這樣搞，我便吃不消，受不了。」知識分子自尊心是很強烈的，我們不傷害自尊心是很重要的。自尊心是要照顧，但是應該了解如果自己思想上有毛病，爲了高度向人民負責，自己講講，大家提提意見，受一些批評，並沒有什麼不好。我們共產黨員是天天批評檢討的，有毛病便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就是要向人民高度的負責，工作不可能沒有毛病的，大家指出來不是很好嗎？爲了革命，爲了真理，受批評應當抱歡迎態度。受批評就提到被輕視是不應該的，大家都是搞革命工作，在人格上是沒有輕視重視之分別的，談不到什麼污辱的感覺。今天在我們新社會裏，是講自由的，只許我說，不許你說，這是不可以的。我們是在人民裏面，做的是人民的事業，我們便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必要，大家便有權利提意見，自己也可以提意見。如果藉着批評來污辱人格，那便不同，那是不允許的。如果批評是善意的，彼此都是平等的，這樣的批評是需要的，就是別人誇大一點，動機是好的，也可以原諒，這樣批評是沒有什麼吃不消的。今天我們做的事業，不是替共產黨做的，當然也不是替個人做事，而是人民的事業。過去吃飯是爲剝削階級服務，有些是靠裙帶關係，是靠吹牛拍馬，是靠做着不可告人的事情，現在是不同了，是靠爲人民做事情，既然

如此，我們就只有光榮的感覺而不應有自卑的心理。有錯誤檢討便檢討，檢討批評便把錯誤丟掉，這樣不是很好嗎？同時，也不能說：「光是黨員批評非黨人士。」其實我們的黨團員批評檢討的次數是更多的。當然我們的黨團員，應當在工作中做模範，有毛病，有錯誤，首先自己檢討自我批評，請求非黨人士對我們批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人民內部改善工作提高覺悟的一個重要方法，共產黨員必須勇於檢討，勇於接受批評。但也有些人他不是善意批評協助我們改正工作中的缺點，而是根本上討厭我們的社會，感到人民討厭，感到人民民主政權什麼也不好。這些看法，是出於他們階級本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有很多的缺點，如糧食會一度緊張和買某些東西要排隊等，還是處理得不夠好，但五年來總的方面，我們是搞好了，不能因為看到這些缺點，就把總的方面是做好的也加以抹煞的。但是他們只是看到缺點，看不到成績，只看見樹木，看不見森林。如果他們認為在新社會這碗飯吃不下去的話，我們可以等待事實會教育他們放棄階級成見的。當然批評黨、和黨團員，並不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有實際材料、證據確鑿的，今後教師們提意見，不要有顧慮，只要從工作出發，那就不怕批評的。在毛澤東時代，絕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第三點，有些教師說：「現在講話，多講多錯，少講少錯，不講不錯」引伸下去，便會「不講也錯。」這些教師是說，我們沒有言論思想自由。這種看法自然不對。我們共產黨是十分民主的，是十分自由的，只有對反革命分子，才沒有民主，沒有自

由。有人說：「關於紅樓夢問題，俞平伯只寫一篇文章，你們寫了一篇又一篇，為什麼你們把俞平伯罵得這樣，把俞平伯搞得幾乎混不下去？」我們認為俞平伯的紅樓夢問題研究是錯誤的，從思想本質講是反動的。但是俞平伯不是反革命，這是思想方法問題，是學術思想論爭問題，這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如果俞平伯願意再講，他可以講的，願意發表文章，他可以發表的，如果他不服，也可以反駁的。最近他在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就發了言，報紙上都發表了，大家可以看看。胡風在還未揭發他是反革命以前，我們與他開展文藝思想論爭已經十多年了，抗日戰爭時期，在武漢、重慶、香港，解放後在北京都爭論過，這時我們還是作為人民內部問題，作為學術思想問題來搞的。只有現在知道他是反革命之後，才不容許的。如果不是反革命的話，思想言論是有充分自由的。如中山大學陳寅恪老先生，我想他是一個好人，他在學術上有研究的，解放後，他不走，願意留下來，但是他對我們是有意見的，對我們的觀點方法是不很贊同的。因為這是人民內部的事情，只要不做反革命活動，我們是容許的。他如果要出版書籍，是可以的，現在他不是出版不少書了嗎？思想不一致是不容許的，思想的發展，是有先有後的，慢慢便可以一致。再如胡適思想是很反動的，我們必須批判，但有不同意見，如作為思想問題，可以開展爭論的。如中山大學一個教師說：對胡適的論點是否錯誤，他要等到二十年後才看得清楚。我認為可以，就是等三十年、四十年也可以。但是必須講清楚，個人學術思想論爭與對學生講課不同，不能

混爲一談，學術思想論爭，是作爲在學術思想上個人的意見，但上課便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學校、整個國家事情，我們教師是代表國家來做事的，我們要向國家負責，這方面我們不能作爲個人學術思想論爭而論，對講課內容方面，高等教育部也是有規定的。所以我們說：在人民中是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但是不能做反革命活動。只有對反革命分子才不能自由，不但沒有思想自由，也不能有輿論自由。因爲他們如有輿論思想自由，我們便沒有自由了。憲法上明文規定的，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對人民是民主、自由，對反革命是不容許民主、自由的。什麼叫做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言論呢？便是有意污蔑革命與人民政權並從根本問題上來反對革命與人民。如廣州買某些東西要站隊，有些人有意見，提出是否可以改變，是否可以少排一些。排隊是社會主義建設不可避免的現象，這是由於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物資生產趕不上產生的，但也有由於我們供應工作上的缺點所造成的。屬於前者應當說清楚大家忍受一下，屬於後者必須立即改正，如批評後者的缺點那應是十分必要的，如這些對工作的意見，我們當然不能說這是反革命言論。但有人說：「共產黨不如國民黨。」，「解放不如不解放好。」這不是什麼工作意見了，這是污蔑，從根本問題上否定共產黨和人民民主政權的成績，這是反革命言論。憲法上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領導的，是要建設社會主義的，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便是犯法，是不容許的。故此，我們要把革命與反革命界綫劃清，不然大家對黨、政府的工作有意見，便作爲反革命，

這還得了嗎？大家便不敢講話了，那就很危險。必須明確：共產黨與人民政權是不可反對的，但是可以批評的。我們所有黨員必須充分懂得這一點。

第四點，關於宗教信仰問題。憲法上已規定，我們是保護宗教信仰的。不論信什麼教，都是保護，不會取締。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信仰，有相信唯物主義的，也有相信唯心主義的，相信宗教的，也有不相信宗教的。有些是進步的，有些是落後的，這是一個覺悟高低的問題。但是要與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區別開來。他要做禮拜可以，掛耶穌像可以，穿宗教的衣服可以，掛十字架章可以。不看馬列主義，看聖經也是可以。但是不能以宗教來從根本上破壞政權，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不能與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有聯繫，拿宗教來煽動羣衆破壞革命。這是沒有自由的，因為這不是信仰問題，而是反革命問題。

三、辯證唯物主義是不是可以拒絕學習？

現在，公開說堅決不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人，大概是沒有的了，但是不是那樣積極學習的？是不是內心還有抗拒的情緒？應該說，在黨內外說來還是有的。

我們黨中央提出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並在全國範圍內爭取在八年內，在全國黨內及黨外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加強唯物主義學習，達到分清什麼是唯心主義，什麼是唯物主義，這是一個好的意思，不是一個壞的意思。為什麼要學習辯證唯